

外 教 社 翻 译 研 究 丛 书

A Reductionist Approach to Translatology

翻译学归结论

赵彦春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 教 社 翻 译 研 究 从 书

A Reductionist Approach to Translatology

翻译学归结论

赵彦春 著

藏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学归结论/赵彦春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ISBN 7-81095-618-3

I. 翻… II. 赵… III. 翻译理论—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8398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支顺福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25 字数 317 千字

版 次: 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书 号: ISBN 7-81095-618-3 / H · 236

定 价: 1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总 序

翻译研究是不是一个学科,翻译有没有“学”,现在不应该再费时论争了。董秋斯 1951 年就提出要建立翻译学,要写出两部大书,一部是《中国翻译史》,另一部是《中国翻译学》。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为《翻译研究丛书》写的总序中第一句就宣称:“The grow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is a success story of the 1980s.”(1993) 我国 1979 年就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6 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首批“翻译理论与实践”(二级学科)的硕士点,现在已有一大批以翻译研究为学术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1989 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都陆续设立了一些翻译研究项目,1992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正式定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中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虽然这个学科定位还不够科学,但这个学科的存在已被公认。这说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和发展的。

近 20 年来,这个领域的国内外学者都在努力加大研究力度,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次,陆续出版了不少翻译学研究的新成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满足国内翻译教学的需求和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经过精心选择,引进了一套“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现已出版 29 种),这在我国翻译界还是第一次。这套丛书在翻译教学和研究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它的重要参考和借鉴作用。



但是引进与借鉴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结合我们自己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实践进行新的创造。怎样创造?许多学科的发展史证明,要创造就要中外结合。怎么结合?中国学术史告诉我们,要结合就要以自己的研究为根基,以国外的研究为参照,借鉴其理论与方法,改造和创立基本范畴,建立新的范畴系统。这个以自己为主的中外结合的原则就是学科建设的方针,也是我国翻译研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引进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我们的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与研究,写出与我们自己的实际密切结合的论著。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这样的著作,对翻译学的建设起到了某种程度的推进作用,功不可没。但从理论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来说,我们还没有一本多数人认可的《翻译学导论》。此外,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性研究、外国译论的借鉴性研究、翻译实践(包括翻译教学实践)中新问题的探索性研究、相关学科(如文化、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社会学、哲学等)的吸融性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多层次研究(包括本学科的和相关学科的)等几个重要领域,也都缺乏高水平的系统研究的论著。

为了进一步推动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满足这个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教学与研究的需求,我们特别组织国内专家撰写以翻译学学科本体研究为主的系统的理论性论著——“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在筹划此套丛书时,我们了解到中山大学“985”学科建设项目也正组织编写“中山大学翻译研究丛书”,我们很高兴把他们的这些选题纳入到“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中来。本丛书是一个开放性的系列,我们撰写、约稿的原则是:(1)作为翻译研究类的学术专著,应充分反映本领域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2)追求理论的系统性和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目的是对翻译学的发展和翻译人才的培养起重要的推动作用;(3)用汉语撰写。读者为高等学校翻译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师、研究生,翻译学界、语言学界以及文学、文化、哲学与心理学等学界的翻译工作者和爱好者。

翻译是人类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I·A·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曾说,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最复杂的一类活动。



它的复杂性必然对我们的研究构成挑战,要求我们的研究不断拓展,不断创新,不断深化。从古至今,大体说来,人类对翻译的研究已有了直观经验式的、文艺学的、语言学的、文化学的等多种视角和方法。我们相信,我国的学者一定会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一道,对人类这项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断加以探索,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编委会

3

总
序

何谓翻译？

——《翻译学归结论》序

赵彦春教授赠送我他的大作《认知词典学探索》，我刚刚看完，他又寄来了一大本书稿《翻译学归结论》（*A Reductionist Approach to Translatology*），让我读后提出修改意见并赐序。我认真完成了他布置的作业，因为我是学生。我这样说不是故作谦虚，理由很充分，因为我一向信奉一种观念：“读谁的书就是谁的学生”。我决心一辈子学着当学生，因为当学生好，一是总感觉年轻，年轻就有好学上进的欲望；二是没有太多精神负担，说错了做错了有老师帮助，就是老师严厉的批评也是爱护的批评。但真正一辈子当学生决非易事，因为当学生有四大障碍。第一，权力大了很难当学生，因为它有“魔法”，它能使一些比较愚蠢的人自作聪慧，使一些低能者自感高明。做了官怎么还用当学生？！第二，金钱多了也很难当学生，因为它有“妖术”，它能给一些人买来文章，买来学位，买来职称，还能买来官职，甚至还能买来“鬼推磨”，哪里还需要去当学生？！第三，是学问的障碍。学问大本不应该影响当学生，但它也会给一些人带来“邪气”，刚有点学问就自视过高，就不愿与同类为伍，当然更不会去当晚辈的学生。第四，是年龄障碍。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人老了，退休了，理所当然的不应该再当学生。1991年4月17—23日在杭州开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讨会，有幸和周有光先生同桌吃饭，他那年86岁，他说80岁学会电脑，几年来写的文章要超过前半生的了。从周先生那里我深深感到人的进取精神在于心态年轻，生命在于运动，更在于学习，我们的确应该活到老学到老。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要想兴旺发达，只有永远学习，永远做学生。

彦春的新作《翻译学归结论》是针对国内外翻译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主要倾向而做的一项系统的理论研究。这个主要倾向就是文化派及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对翻译学建设的影响。文艺派、科学派（语言



学派)、文化派(翻译研究派)、多元系统派、解构主义派,还有功能派、目的派、女权主义派和操控派等在翻译研究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扩大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能较好地解释过去就存在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翻译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译者,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推动了翻译学的发展。但他们有些观点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给了译者过大的权力,使翻译有趋同于创作的倾向。这就使翻译的本质属性发生了异化,逐步走向了自我否定。彦春的这本著作就是针对这个大问题而进行研究的成果。本书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评判了文化派、女权主义派、操控派等流派的功过。第二部分针对前面提出的问题提出了用归结主义方法研究翻译的本体,廓清了翻译的基本性质:“忠实”、“对等”原则不是机械的、片面的,而是辩证的、普遍的、本质的,属常态;“改写”、“操控”等是特异的、非本质的,属偏态。在此基础上把翻译界定为:翻译不是静态的代码转换,而是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以意图为归宿,尽量使译文向原文趋同的动态行为。第三部分用关联理论分析了翻译的本质属性,从而构建了关联理论的翻译模式。第四部分是对关联理论翻译模式的验证。这部分以语篇和语言的形意关系为主要参数通过许多实例的分析验证了关联理论翻译模式的有效性。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应该是:(1)冷静而深入地评判了文化派等后现代思潮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影响,指出了其功绩和非科学倾向及其危害;(2)运用关联理论构建了有效的翻译模式,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条新思路;(3)综合运用和评判了许多研究方法,也检验了归结主义方法,对翻译学方法论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照。总之,此书是一本有较强批判性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自成系统的翻译理论著作。书中还有不少深刻之处,读者读后一定会有多方面的收获,我在此就不具体评说了。此书稿给了我颇多启发,于先睹为快中联想到许多问题,现将两个主要问题提出来和同道讨论,进一步促进我也促进大家更深入的思考,更系统的研究,以推动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

(1) 何谓“翻译”(translation)? 彦春这本书开宗明义告诉读者:“我们必须直面翻译学的根本问题:翻译的本体论(即它是什么,它存在的本源,它具有的本质)和认识论(即我们能否认识它,如果能够,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它),以及相应的方法论(即应用或设计什么方法来



研究它)。”所以这本书的核心是对翻译本体的研究,也就是要回答何谓翻译的问题。由此我想到人文科学发展的模式问题。作者为什么把翻译学的建设归结到翻译本体上呢?因为他抓住了人文科学发展的“返祖”模式,也就是用新观念、新方法研究老问题。这是人文科学发展的一个规律:一般是学科发展出现了有重大争议的问题,这时理论意识强、关心学科发展的学者常常首先针对这个学科最主要的范畴提出质疑,以引起大家关注和讨论,比如研究语言学的提出何谓语言,研究文化学的提出何谓文化,研究翻译学的提出何谓翻译。从历史上看,研究哲学的质问何谓哲学的次数可能最多,读过中西哲学史尤其是西方哲学史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认识。提出问题,然后就用新理论新方法去研究它,进而重新界定它:厘定研究对象,明确学科性质与定位,建立新的研究方法。赵著就是用这样的方法重新界定了“翻译”这个范畴。在这个重新界定的过程中,他确认“忠实”与“对等”是本质的,属常态;而“改写”与“操控”是非本质的,属偏态。我们知道,传统的本体论哲学说到事物的本质就是指本体论意义上的、还原论意义上的、归根结底意义上的本体、本原、始基。唯物主义视物质为一切事物的本质,唯心主义视精神为一切事物的本质。后来一些哲学家把认识对象二分为现象和本质,认为“本质”就是事物比较深刻的长期稳定的方面,是组成事物基本要素的内在联系,是有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而“现象”则是事物比较表面的、零散而多变的方面。现象和本质既相互区别又是对立统一的,本质是现象的根据,现象从不同的方面来表现本质。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应该把“翻译”定义为以原文为本,以译者为中心,以“忠实”与“对等”的追求作为本质属性,竭尽全力使译文全方位靠近原文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之所以把“忠实”作为翻译行为的本质属性,是以创作行为为参照系的,二者的区别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有没有以另一个现成文本为依据。创作可参阅很多资料,也可引用,但不能依照一个现成文本来完成;翻译不管有多少种变体,都必须依照一个现成文本来完成。按照这种观点,林纾的“改写”(严格讲应该叫“改写”)还应叫翻译,因为有现成文本做依据,这文本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口头的,但必须是另一种语言的。如果依照的文本和译文是同一种语言的,那就有的还可叫翻译,比如把古汉语的作品译成现代汉语;但有的就不叫



翻译,而属于创作的变体,比如把小说改编成戏曲,不管是把古代的改成现代的,还是把现代的改成当代的都不叫翻译。翻译和创作之间应该是一个集合(set),可以表示为: $T = \{t_1, t_2, t_3 \dots t_n\} W$,其中 $T = \text{Translation}$, $W = \text{Write}$, t_1 为最接近原文的翻译, t_n 为最接近创作的翻译,中间 $t_2, t_3 \dots$ 为翻译的各类变体。翻译中的这些变体可以适应人类各式各样的需要,因为这是不同人在不同的条件下怀着不同的目的对翻译做了不同选择的结果。彦春的观点很清楚,翻译的常态要忠实于原文,追求译文趋同原文,这是翻译的本质;而“改写”与“操纵”等流派不要求忠于原文,是非本质的翻译,所以属于偏态。

说到这里我想到另一个问题:翻译的常态和偏态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呢?也就是本质和非本质如何来划分?是依据译文离原文距离的大小把这些翻译变体划分成常态和偏态,还是专门制定一个划分两态的标准(如制定就应包含内容与形式的多项指标)?如果按译文离原文距离的大小来划分,那分界点又很难确定,假设 $n = 100$,那么分界点是 t_{50} 好呢,还是 t_{60} 、 t_{70} 、 t_{80} 或者是个什么数好呢?这让人很难做出有科学根据的选择。如果要制定一个划分两态的标准,那就需要研究并界定“常态”与“偏态”以及“本质”与“非本质”这两对范畴的外延和内涵。这里还有个问题:非本质的翻译就是异化了的翻译,那它还有资格叫翻译吗?为什么还叫它翻译呢?不能把它划分到翻译以外去吗?

综观国内外翻译理论界现状,迫切需要我们回答何谓翻译的问题。国内的翻译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没形成不同的流派。国外有了很多流派,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研究翻译,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局面,有的重视原文文本,有的强调语言的客观性,有的突出译者的主体地位,有的强调翻译过程和干扰,还有的把重点放在译文读者(包括控制译者的译文使用者)与译文的影响上等等,但他们都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没有较全面、较系统地按照学科制度的规范进行研究与建设,比如翻译学本体研究现在还是停留在 James Holmes(1972)的水平上,没有多大的进步,再比如对翻译如何消解人类的矛盾和如何抵制商业化对精神文明的破坏等深层理念的研究很少;二是翻译研究对象是个多因素的复杂多变的系统,不应该只研究某些单个的因素,而应该强调研究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复杂



的大系统。研究这样复杂多变的大系统恐怕不能只用过去习惯了的原则和方法,而应该探讨新的思路与途径。我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都应该十分关注科学发展新时期到来的问题:我们的学术思想“目前正处于线性与非线性、系统与非系统、逻辑与非逻辑以及有序与无序、必然与或然等对立范畴的矛盾交织时期。这一时期正孕育着思维方法的巨大变化,人们对于整个世界图景的传统观念也将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齐整、稳定、平衡、有序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崇信,这种崇信反映了人类潜在的心理倾向的桎梏,以致使人们对于世界图景的把握一直在自我设定的圈子里流连。然而,克劳修斯热力学第二定律及熵的概念,普里高津耗散结构理论,洛伦兹对大气湍流研究中所涉及的混沌(chaos)现象以及在数学、量子力学、生物学、化学等领域的非线性科学的发展,提出了一个与常规全然不同的思路。”(夏军:《非理性世界》,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第 429 页)“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科学转向复杂性多变量系统研究的深入,各种关于非线性复杂系统的研究才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自然、社会、思维中更为普遍存在的是非线性。非线性完全改变了人们的传统因果观,也为世界的多元化、多样化提供了合理的说明。而且,它不仅关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也是关于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赵凯荣:《复杂性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4 页)我们在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等方面共识愈来愈多,但在研究方法上还研究得很不够,我们预计翻译学建设的突破性进展,恐怕只能在上述学术观念上照下从建立新的研究范式入手。

(2) 何谓“意义”(meaning)? 前面我们讨论了“翻译”的复杂性,翻译之所以让人感到复杂主要是因为人对“意义”及其相关的问题还研究得不够,还没有达到比较深入和比较系统的认识,客观原因应该说是因为意义太复杂,比如它的来源,影响它产生与变化的因素之间的关系,它发展变化的规律,它的结构和工作的机制等问题,现在大都还说不很清楚。我这里想先说说“意义”的重要。从人类(尤指现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来看,“意义”可能是第一重要的东西,因为人活着有低和高两种要求,这两种要求,尤其是高要求的内容都集中在“意义”上。低要求是生存,但生存的标准可能差别很大,因此生存可以分出很多等级,但不管



等级有多少,只要他们只追求生存,那这类人对意义的理解和需要就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活着的意义,那就是生存(生存的意义再多那也只是生存),没有更多的内容;另一方面就是如何活着的意义,人活着靠什么,靠物质,但也要靠语言交流,因为物质的获得也终归靠语言交流,交流什么,交流意义。可见人类就是靠了对语言中意义的理解和选择而得以生存的。这两种意义显然是不一样的,前者的含义就是“人生价值”,其内容随着人类的发展越来越复杂,这种意义对后者起导向作用;后者的含义就是语言的意义(包括交流中产生的意义),其内容也是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前一种意义的发展而越来越复杂。人为生存而活着这是最低要求,相当多的人,尤其是受教育者,不是为生存而活着,而是为一个“意义”的世界而活着,这个意义是“较高级的人生价值”,这就是高要求,其内涵要比只求生存那个“人生价值”的内涵丰富多了,也就是追求的目标增多了:为个人、家庭、群体、民族、国家;也为权力、金钱、感情、名声;当然还为那个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美好的精神世界,这些都是不同的人追求的不同目标,也就是不同的人生意义(价值)。这种人生意义影响人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和选择,因此我们研究“意义”就应该既研究“语言意义”,也研究“人生意义”,而且还应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现在要问到底何谓意义?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古代哲学家大都讨论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讨论“存在”是什么?“人”是什么?人和其他动物有什么不同?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讨论如何给各类事物命名?什么是“名”?什么是“实”?二者有什么关系?中国古代有阴阳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讨论,也有关于名与实的切磋,比如《墨子》中就有“以名举实,以辞抒意。”古希腊早期讨论“水本原”、“火本原”、“数本原”等问题,亚里士多德已认识到语言是思想的符号,通过思想指示实体。由此可知人类走着大体类似的道路。从这里来看,研究意义就必须研究语言、思想与实体三者之间的关系,但这三者都和人相关,语言要靠人用,思想是人认识世界(包括人本身)的结果,实体(real world)是人认识的对象与创立意义的根据,因此研究意义就应该研究这四者的关系。这些关系包含了和意义相关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这个系统既有静态的一面,更有动态的一面。因此我



们研究意义既要研究语言的静态意义又要研究它的动态意义。所谓静态意义,实际上就是人类长期使用中沉积下来的被人类共识的那些意义,它们大部分被各类词典记录了下来,当然这部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人类不断地对其修改和补充,所以静中有动。动态的研究就复杂多了,比如研究一个句子在一个特定语境中的意义,首先要研究句子结构本身的含义,也就是静态意义,然后就要研究静态意义之外的动态意义是从哪里来的,可以从多方面着手,但主要应从分析说/写此句的人和该句的关系入手。这至少要回答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他/她具备哪些条件才能说/写出来这个句子?这些条件之间的关系如何?二是他/她为什么要说/写这样一个句子而不是另外一个句子?哪些因素影响他/她对句子的选择?这些因素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第一个问题主要包含语言能力和个人语言风格的复杂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第二个问题主要包含人的交际能力的内外因素及其内与内、外与外以及内与外等三个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说/写者和时空中从古至今各种事物的关系,比如和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学校、群众团体、政府的关系,和大文化[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及其历史的关系,和外国的人与社会以及文化的关系,还有和大自然(即宇宙)的关系等等。说到底意义是从这各式各样的关系中来的,因此要想比较清楚地认识意义的本质和划分意义的各种类型,那只有研究和意义相关的各种条件与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观念可以叫做意义的关系主义(connectionism)理论。

为什么 I. A. Richards 说翻译可能是“the most complex type of event yet produced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smos”(1953)?这主要来自意义的复杂性,当然语言形式的翻译也很复杂,有些方面追求趋同或是趋近都是很难办到的,比如语音和文字等。由于意义复杂,现在还难以找到普遍性较高的规律,所以有些学者[影响大的主要是蒯因(W. Quine)与德里达(J. Derrida)]就有意无意地夸大意义的不确定性,这样一来好像就找到了解放译者的根据,于是就放弃了趋近的追求而主张任意性的翻译。彦春的这本书重点批评的就是这种主张。意义的复杂表现出了不确定性的一面,但它还表现出了相对确定性的一面。事



物是变化的,但事物的本质属性变化很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比较稳定,比如基本词语的本义、语法结构等,相同或不同语言群体中成员之间之所以能够正常交流信息,就是基于意义的相对确定性。如果意义不用说天天变,就是一年一变甚至十年一变,那么人类的交流、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还有多少?我们人类总是生活在无奈之中,一方面要承认意义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还得承认它的相对确定性,过分夸大谁都不行,但又不能对等平分,怎么办?那就只能研究二者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用百分比说明,因为它们不是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关系。我们的水平和能力就只能体现在研究这些无奈问题的复杂关系上。

“翻译”和“意义”自然也是《翻译学归结论》的基本范畴,书中有辩证、深刻而明晰的论述,尤其是作者将“道”与当今的宇宙论连通起来,作为翻译学归结论的深层理据,将翻译研究纳入到了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开放的体系。我有感而发,不知上文的相关想法对关心这类问题的同道有无启发,对这类问题的研究有无意义。我想读者自会在阅读《翻译学归结论》时参与探讨,而历史和翻译实践也将会对种种新论做出客观而公正的评判。

杨自俭

谨识于中国海洋大学六三居室

2005年2月24日



序 言

廖七一

世界地理政治的飞速变化,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相关学科、跨学科,特别是认知科学的迅猛发展,必然对翻译研究产生空前的影响:翻译研究成果“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趋势,研究思路变得繁复多样,研究领域迅速扩展”,“研究方法、理论学说、研究目的、名词术语和技巧程序”彼此各异,“令人眼花缭乱”。^① 这是对当今世界翻译研究的生动描述。在过去的 20 余年中,中国译学艰难但迅速地跨越了从对“信、达、雅”无休止的议论,奈达、卡特福德、纽马克、威尔斯等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引入,到巴斯奈特、列费维尔、赫曼斯、埃文-佐哈尔、图里等的多元系统、操控理论、规范原则、女性批评、后殖民主义等翻译思想或流派的评介和接受的过程。研究论著和论文不断涌现,翻译研究中心、翻译系,甚至翻译学院也陆续建立,这一切都促进了中国译学的繁荣:研究范式逐渐转变,研究范围持续扩大,研究视角日趋多元,方法和手段也更加客观、科学。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扩展研究领域、开拓研究思路的同时,也使翻译研究的边界日益模糊。J·霍姆斯在著名的《翻译研究名与实》一文中曾规划出翻译研究的学科领域,使翻译研究从此超越了狭隘的技能和纯粹的应用层面。但是,中国译学的发展在突破“对等”、“忠实”等

* 为表明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没将序言与正文中的译名统一起来(著者注)

① 廖七一等编:《当代英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1页。



概念的同时,明显地表现出超越翻译学作为一个学科应有边界的趋势。有学者在质疑文学研究中“大文化批评”时指出,“大多数研究,只不过是文学的文本拘来面前为神话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以及各种主义作注解而已……不讲审美,只讲文化;不讲艺术,只讲主义”,“大与空泛常常会成为同义词。大物象、大思想,承接之日往往就是滑入浮躁之时”。^① 翻译界不少学者也有同样的担心,担心翻译研究的本体或中心正在消失,翻译研究面临被文化研究所取代的危险。

西方译学的引入带来了中国译学思想的转变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反思近20年中国译学走过的历程,人们会发现译学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是批判意识的缺失,西方译学思想更迭或发展中体现出的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在中国似乎还没有形成气候。无论是对于中国传统译论还是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往往满足于诠释与跟踪,因袭多而创新少,证实多而证伪少,守护多而诘问和质疑少。佛马克认为,“在所有学科中,严格意义上的研究都伴有批判阐释的因素。”^② 批判意识的缺失必然导致对外来理论的“翻炒”与“跟风”。在译学发展的初期,引进、译介、拿来,甚至“翻炒”与“跟风”都具有积极的作用,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普及学术思想、传播研究成果,促进理论的建构。但从译学研究长远的发展来看,我们似乎更需要批判性的接受,需要扬弃,需要将外来理论本土化。否则,我们始终只能落在人后模仿与爬行。

批判意识的缺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理论建树意识的淡漠。译学界似乎多注重个人翻译经验或翻译细节,多集中于具体作品或某个译者的翻译活动,“很少从局部上升到全面,从个性上升到共性,很难通过对比、验证假设而上升为系统的理论”。^③ 与中国传统文论研究相似的是,人们似乎对系统理论或理论系统存有偏见,甚至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译学研究中多“闪光的”只言片语、精到的点评或“微言大义”而缺少较为宏观的理论建构。按霍姆斯翻译研究的构架,我们似乎更重应

① 曹文轩:质疑“大文化批评”,《新华文摘》2004年第2期,第81、82页。

② 佛马克:《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页。

③ 《当代英国翻译理论》,第389页。



用翻译而轻纯理论的研究。即便有所谓的纯理论研究,也大多集中于成品、功能和专题,多细节考证、主观印象而少理论概括。当然,这并非是翻译研究独有的现象;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这种现象似乎比较普遍。这或许是中国学术传统的遗传基因使然,或许是长期缺少学术自由的必然后果。

赵彦春教授的这部《翻译学归结论》最突出的特点正好是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理论建设意识。研究范式的转变是科学研究革命的根本因素,也是翻译理论发展与更迭的内驱力。而所谓的转变就蕴涵了批判性的接受和创造性的转换。赵彦春认为,目前的翻译学研究“尚处于人云亦云和众说纷纭的前科学或前—前科学阶段。”因而在绪论中提出,对当前流行的文化派翻译理论,我们必须“慎思之、明辨之”,“取其精华”,“避免盲从”。我们必须“直面翻译学最根本的问题:翻译的本体论(即它是什么,它存在的本源,它具有的本质)和认识论(即我们能否认识它,如果能够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它),以及相应的方法论(即应用或设计什么方法来研究它)”。对于翻译文化转向而引发的翻译研究“多元性、混乱性和弥散性”,作者提出了归结主义(reductionism)翻译学方法论的设想,以“叩开翻译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门”。^①其间体现出的批判精神与建构意识在当前的翻译研究界尚不多见。

翻译学归结论的提出,是对当前最具影响的文化派翻译理论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从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韦努蒂的规范原则,巴斯奈特的“共谋”,列费维尔的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系统,到女性主义的翻译批评,赵彦春不仅有独到的理解,而且能从翻译的本质属性阐发开来,发现其中的偏颇与失当。他认为文化派有意无意夸大了翻译的非本质属性,将翻译的多学科、跨学科的属性泛化为无学科(a-disciplinary)的属性。^②文化派,特别是操控理论、改写理论在强调翻译的边缘属性的同时,过分夸大了翻译的操控与改写,颠覆了传统的“原著”、“译著”、“忠实”、“对等”等基本概念,进而将翻译推向虚无,消解了翻译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存在,翻译的限定条件、贯

① 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绪论。

② 同上。